

# 温柔的流亡者

文/FT 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本文分三部分, 分别于 2013 年 9 月 23 日, 9 月 26 日, 10 月 10 日发表于 FT 中文网, 链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2578>;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2682>;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2815>)

—

在布满灰尘的书架上, 王丹发现了这本《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集》。他不明白“不同政见者”的意思, 也从未听过两位编者萨哈罗夫与麦德维夫的名字, 出于好奇心, 他把它借回家。

这是一次意外的发现。“那些作者在书中列举的事实, 比如斯大林主持的肃反, 比如苏共宣传对人民的愚弄等, 使得我第一次看到了所谓‘社会主义’与共产党的另一面……”他后来写道, “我第一次看到原来在我们习以为常的宣传之外还有完全不同的论述。”

此刻的王丹是北京四十一中的一名高中生, 阅读广泛, 活动力强。他也是个标准的“理想主义者”, 既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 也同时为狄更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激动。这正是共产主义实验的吊诡之处, 它制造了无穷的灾难, 仍能激起人们的理想憧憬。

文化大革命、林彪事件、四五运动、毛泽东去世、邓小平复出……王丹的童年是在一连串的历史事件中度过的, 中国是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 一个儿童也难

逃影响。不过1岁，他因父亲来到江西南昌附近的鲤鱼洲的“五七干校”生活，“在迈开人生旅程的第一步时，就走在了‘五七道路’上”。他5岁时在幼儿园登台演讲，当邻居郭大爷拒绝给他糖果时，他还用糖纸写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声讨邻居的“资产阶级不良作风”。他日后的人生就是这样一个摆脱极权阴影的挣扎过程。

尽管遭逢如此多的悲剧，人们对于这个体制与信仰系统却缺乏根本的怀疑与反思。当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时，他又赢得了一片欢呼，人们似乎再度原谅了这个党与它缔造的邪恶制度。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象征了即将到来的1980年代的矛盾性。在一个漫长的冰冻期后，人们努力尝试一切，试图冲破各种禁忌，在表面的自由之下，是一个从未改变的体制，当它的根本权力被触及时，它会毫不迟疑地露出利齿。

在此之前，人们要拼命地享受这骤然出现的自由。少年王丹也是如此，他沉浸于突然到来的多元思想与文化思潮。《第三帝国的兴起与衰落》、《射雕英雄传》、斯汤达、席慕容共同涌到了眼前，邓丽君的歌声比邓小平的政策更为诱人。他也同样被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理想鼓舞——它们都有一种救世情怀，符合一个少年人的英雄与浪漫情绪。

这本《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集》打开了一个新窗口，它让一个思想正统的少年开始以另一种眼光来观察世界。这也象征着思想的传播又是多么出人意料，不管多么严密的控制都存在着缝隙，这本原本供高级干部参考的内部出版物流进了一所中学的图书馆，把一位少年引导上一条“持不同政见者”道路。

一本书改变世界观，或许是一种日后回忆的夸张。但北大的确把他引入了一条更为自由之路。

八十年代末的北大校园与中国社会一样，正处于一个思想与情感的沸腾时刻。国家控制的减弱，一个自由空间日趋形成，各种彼此矛盾的思潮、学术与实践交杂在一起。倘若五四时代是一个启蒙时代，八十年代就是一个新启蒙时代。知识精英在其中扮演着令人瞩目的角色，他们的使命感与被期待的程度，也唯有五四时代可比。

王丹忙于体验这眼花缭乱的新生活。参加各种话题的讲座，听完了《河殇》的讨论会、就再去理解通货膨胀的原理，他创办文学杂志，第一次体验到上街游行的滋味……

这一切忙乱而刺激。在短暂却浓缩的北大时光，他最富有成效的角色不是单纯的思想者或活动者，而是一个联结者。他在知识与行动之间寻找联结，也在知识分子与学生间建立桥梁，他创建的“民主沙龙”与校园杂志，把方励之、许良英、戴晴这样的人物带入学生中间，也把青年人的朝气与理想传达给这些知识分子。他表现出某种罕见的历史自觉性。他对“反右”与“文革”产生了浓厚兴趣，试图与上一代知识分子的传统连接起来，他也关心苏联的异议传统与缅甸学生的反抗，这种历史感是支撑他渡过日后漫漫旅程的最重要力量。

但不管对于中国的未来或是自己的未来，他还没有任何明确的设想，他正沉浸在一种令人兴奋的尝试中。他也预感到重大的历史事件可能会发生，但对它的残酷性缺乏丝毫的想象，毕竟在整个八十年代，自由与禁锢、改革与保守的力量拉锯中，似乎总以前者胜利为告终。

历史突然涌来，把这个 20 岁的知识分子活动家推到了中心……

## 二

我在《王丹回忆录》中看到这段往事，它拉近了我与他的距离，我差点就忘记了他与我出入同样的三角地与 28 楼，在未名湖旁与西门的草坪上游荡。

在书的封底，是那张著名的照片，他站在黑压压的人群中，背后黑压压的人群与模糊的天安门城楼，他的头发软软的扣在头上，鼻梁上架着宽宽的塑料框眼镜，身上则是过分松弛的绿色夹克衫，左手握一叠稿纸，右手拿着麦克风，脸部清瘦、充满稚气，却有一种不容轻视的庄严——那或许也是 80 年代气质的一次完美展现，理想主义者们不顾自身的脆弱与现实困境，试图超越自身、奋力一击。

整个 1989 年夏天，我是在长安街旁一所小学课堂里度过的，焦虑而疲倦地准备初中考试。上课时，我听到零星的枪响，在夜晚也曾被坦克的轰鸣声吵醒，偶尔看电视，总是广场的混乱的景象，我模糊地意识到这个国家有大事发生，却没我面临的考试重要。我没对这些年轻人产生过特别的同情，反而有一种疏离。

我父亲是军人出身，笃信秩序的重要性，他也是邓小平政策的受益者，认定这些广场上的学生带来了过多的不安定，尤其是当戈尔巴乔夫来访时，觉得这些未撤出广场学生让国家蒙羞。这种看法也影响到我，尤其是当中央电视台开始大肆诋毁学生领袖，对死伤军人大唱赞歌时，我真心相信这是一场动乱，对于被悬挂与焚烧的“烈士”充满同情（我至今不知道这些惨案是否真实）。我也记得印在《人民日报》上的几排黑白照片，他们是 21 名被通缉学生，为首的是王丹，第二名是吾尔开希，他们看起来倒当真像是通缉犯。

夏天过后，我如愿地考上了重点中学。新教材中有一本薄薄的黄色小册子，正是关于天安门的学生，政治老师喋喋不休的用“反革命暴乱”来形容这一事件，王丹、吾尔开希、刘晓波乃十恶不赦之徒。不过比起这些宣教，一个更有力风潮

的出现影响了我和同学们。在这一年秋天，一部叫《潮：来自台湾的歌声》的专题片在中央台播出。电视画面上天安门广场那群焦灼、声嘶力竭的青年，被小虎队、童安格、金素梅的形象与声音替代了。同学们兴奋地翻录最新的台湾专辑，谈论赵传与四大天王，谁还在意这年夏天发生了什么？在整个中学时光，1989年似乎突然消失了……

1995年，我进入北大，感慨故园不在，一股平庸涌动。这是一个去政治化、去理想主义的校园。诗歌、思想与天下事，再不是年轻人的生活重心。燕园里最受青睐的社团是山鹰社与爱心社，三角地贴满了TOEFL、GRE的培训广告，而不是政治宣言、文学沙龙。游行更成了一种禁忌，我唯一的体验是1999年的反美游行，那是校方允许与组织的，用旅行车把同学拉到美国使馆前。与八十年代的亲西方态度不同，一股狭隘的民族主义浪潮开始兴起，用来填补共产主义破产的价值真空。

我缅怀五四时代与八十年代，却从未对1989年的广场感到特别的兴趣。只有一次，我随余杰在勺园的一个韩国留学生宿舍里观看纪录片《天安门》，那真是血脉贲张的一刻。广场上“人山人海、到处飘扬的横幅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我也对片中王丹那镇定自若的表情、刘晓波的口吃与梁晓燕的清新印象深刻。

这感觉短暂、没激起我继续探究的兴趣。我对未来雄心勃勃，1989年的天安门不仅意味着危险、也代表着往昔，如今比尔·盖茨、哈佛商学院、全球化才代表着我要努力的方向。对于王丹、刘晓波或是“天安门母亲”的遭遇，即使我有某种下意识的同情，却也认定他们代表着被翻过的历史一页。在官方全面遮蔽了这段历史后，我也与很多同学一样，选择了主动自我遮蔽。

直到 2009 年前后，我这一看法才发生缓慢的转变。在经过将近 20 年令人绚目也没心没肺的经济增长后，中国迎来了它另一个转折时刻，人们逐渐发现市场经济、全球化、新技术革命并没改变这个政权，各种弊端也浮现出来。随着年龄的成熟，我也终于迟缓地意识到中国背后蕴藏的巨大的黑暗，那些长期被压抑的声音，这个国家的另一种可能道路的被迫中断，还有我们这一代无法逃避的道德责任……1989 年的天安门是探寻这一切的重要密码，王丹则是不容错过的角色。

### 三

在台北一间光线飘乎的 Jazz 酒吧里，我第一次见到王丹。他头发短促、脸庞圆圆的，比起当年被形容成“可能被一阵风吹走”的瘦弱学生，他明显地发福了，不过那股青春劲儿却尤在。

过去几年里，他在这里教书，与罗文嘉创办了一个促进两岸民主的基金会，编辑出版《公共知识分子》杂志……当媒体与民进党需要了解大陆政治时，他是个当然人选。他也卷入了台湾政治，因为一笔经费，他要上庭作证，也深受八卦杂志之苦。不过总体而言，台湾人对于他的印象颇佳，尤其是在对比他当年的战友、另一位住在台湾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时。后者常因生活作风被诟病。

对于“六四”，台湾人的感受即使不似香港人那样强烈，却仍有特别的记忆。当年台湾的媒体对中共口诛笔伐，操着乡音的国大代表们对情况深感忧虑，甚至觉得这又是一个反攻大陆的机会，他们仍用“北平”而不是“北京”的称谓，明星们齐唱《历史的伤口》，把天安门的屠杀视作中国人的失败。北京的学生为台湾学生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榜样，中正纪念堂是一个缩小版天安门。

第一次见到王丹时，马永成感到特别激动。“他真是个咖，”他玩笑地说。相比于北京，台湾的学运只是小事一桩，天安门才是世界性的事件。造化弄人，台湾的学生运动世代不仅迅速获取了权力、也迅速被这权力腐蚀与抛弃，他们的人生像是一场加速度运转，与此同时，天安门一代还处于流亡中，像是被仍到某个停滞的时空。

我仍记得见面时的奇妙。我们喝啤酒、吃辣花生。我带着明显的紧张，他仍是个纪念碑式的人物，我差点就忘记了，他仅比我年长7岁，是比我高不了几级的北大师兄。我们之间似乎横亘着一堵厚墙，墙两侧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

印象里，我们没进行任何严肃的谈话。既然他是个纪念碑式的人物，你该怎样向一个纪念碑发问呢？更重要的是，他的方式与我的期待截然不同。我原本以为会遇到一个凝重、深邃、不无悲伤的流亡者，他却快活、自嘲，有一种过分的轻松，仿佛我们在酒吧碰到的不过是一个老熟人，因为好久未见，没准备、也不知怎样敞开心扉。我试着问起他的监狱生活，他却说几乎忘记了。我也想问他对海外民运的看法，他也是一语带过，我只好继续喝啤酒。

在那次见面后，我仍不时遇到他，我们热烈地打招呼，却从未进行过一次深入的谈话——关于他的过往、他对此刻中国的看法、他内在的忧虑。我们像是熟悉的陌生人。在人群中，他既自在、又孤单。很有可能，这也是流亡的副产品，他需要与周围保持轻松，却无法真地进入其中，或许他也不愿意进入其中。这是流亡的必然副产品吗？它又怎样影响他的政治行为？那个昔日懵懂的中学生的确变成了我们时代最富盛名的“持不同政见者”。

“我现在有耐心，或许太有耐心了，”他说。我们坐在国宾饭店的茶室里，进行我们认识以来第一次认真谈话。他的语调里仍是一贯地调侃。流亡15年之

后，他仍有着北京少年的典型俏皮。他的声音也依旧沙哑，在 24 年前的全国通缉令里，他的特征描述里正有“嗓音沙哑”这一条。今天的声音更低更哑，因为半个月前的一场剧烈咳嗽出血，他的喉咙中生出息肉，医生警告他不能喝酒、吃辣与过多地讲话。

“这和监狱生活没关系，”他连忙打消我的想象。我记得他是在秦城监狱里得的咽炎。这正是我认识的王丹，他回避自我浪漫化。

流亡让他更意识到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这个社会需要准备，他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也需要准备。这漫长的准备过程，不仅是一种生命的停滞，也意味着无穷的希望。

“要是‘六四’成功了，我可能早完了，”他说。怎么样才算成功呢？是天安门指挥部搬进了中南海，学生领袖成了掌权者吗？

王丹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多年来，他要不厌其烦地回应这样的指责——要是你们当权了，情况要糟得多。为这种指责做论据的是中国 20 多年的经济增长与海外民运界的各种内部争执、学生领袖们的不佳个人表现。前者证明共产党的统治是有效的，而后者则似乎表明这些昔日的反抗者是一群多么不值得信赖的人。

他们 24 年前在天安门静坐、请愿、绝食时，从未有取而代之的意愿。他们的诉求如今看来温和得不能再温和，不过是为了重新评估胡耀邦的地位、反贪腐、提高知识分子待遇、争取言论自由、校园民主……这不过是学生们对限于困顿的改革的不满，他们对于现行制度、意识形态，都没有产生根本的质疑。他们甚至也从未想到自己的行动会产生这一连串反应，它远远超越了他们的控制力，他们不再是领导者与组织者，而是被裹挟其中。

台湾的民主转型也给他带来新感受。他感慨两岸的不同命运，台海两岸在 80 年代似乎处于同样的起点，都深受民主第三波浪潮的影响，校园内都在进行相似的试验，但台湾成功了，自己却失败了。当然，他也感慨历史的复杂，这些成功者如今又陷入了强烈的失败感，包括他的朋友罗文嘉与马永成。

但他在台湾能实现多少政治抱负？靠他的两岸基金会、华人民主书院、Facebook 上 7 万个朋友、还是不断涌来的大陆学生？

在一连串的逃亡、被捕、入狱、流亡后，这曾经吸引了整个世界注意的“天安门一代”也似乎没形成一个鲜明有力的政治反对力量。这一代人成立了各式各样的组织，但往往是在明确和稳定的表达与行动之前，就很快陷入了内部纷争。一些学生领袖在屠杀周年纪念时，仍会面对着镜头表态，但他们已普遍创造出新的身份了——风险投资人、牧师、商人、电台主持人，而不再是个职业反对派，他们似乎背叛了昔日的理想。

王丹从不批评自己的同代人，包括也同样生活在台湾、当年和他同样富有盛名的吾尔开希——“你想想看，开希已有 24 年没见过父母，这对人是多大的折磨”。对于当年在广场上过分激动、如今投身商业世界的柴玲，他也更愿意把她的道路视作再正常不过的选择——她成为广场总指挥是个偶然，她也有权寻找新的身份。这种同情或许也是对他这一整代人的，是啊，当他们被推到舞台中央时，他们不过是 20 岁左右的年轻人，没有深入的思考，更缺乏实际的政治历练。如今，批评者们忘记把矛头指向镇压者，反而常把这群年轻人作为标靶。

王丹是最让人尊敬的一位，他不是一次坐牢，而是两次坐牢。在第一次释放后，他出于对“六四”死难者的愧疚与未竟之志，留在政治与社会气氛已经

大变的国内继续他的斗争，因此被判 11 年重刑。流亡美国后，他也从未自我放弃，除去参加正常的政治活动外，还在哈佛获取了博士学位。

在过去的三年中，他在台湾教书。除呼吁、串联与集会，他也在大陆来的交换学生中找到了久违的阵地，这对于一个无根的流亡者显得至关重要，他们中一些好奇者像是打量大熊猫或是史前文物一样接近他，然后被他大大咧咧的孩子王劲儿征服，感慨还有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存在。

王丹乐观地相信，他的努力已使台湾社会意识到中国民主化的重要性，他们搭建的民主平台，很有可能在未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马永成私下却多少觉得，王丹的确维持了一个不错的位置与能量，但对两岸交流却难有太多期待，它找不到真正的着力点。对于中国的海外民运分子，他感到一种苍凉，当年台湾的流亡者普遍抱有强烈的希望，因为台湾会变，但大陆的问题太大、太复杂了，大陆流亡者要辛苦得多。台湾流亡时间最长的彭明敏也不过流亡了 22 年，而大陆“六四”一代流亡海外已有 24 年。在大部分时间，王丹必须要与一个逐渐消失的记忆作斗争：当你问起今日的北大学生，很少有人知道 1989 年夏天发生了什么，也很少有人知道王丹到底是谁。王丹与朋友们发起的“天下围城”活动，与其说是一场政治行动，不如说是一次集体行为艺术，他提醒世界不要忘记。

但对于王丹来说，政治只是流亡的维度之一，它还有另一种意味……

#### 四

“我喜欢残败的东西，美是来自悲哀，流亡是个悲伤的事情，你要离开母体，我在这里中感到一种特别的美。”

被问到流亡与美学的关系时，王丹从厌倦的情绪中摆脱出来，他之前一直用礼貌来掩饰这种厌倦。

自 1989 年夏天以来，他就处于一种流亡之中。先是一种内在的流亡，他被关押于监狱中，然后他被驱逐出中国，外在流亡也开始。流亡的荒诞也注定伴随着他，他要在这种荒诞中创造意义。关押在秦城监狱时，他以 21 岁之龄来理解外在自由与内在自由的区分，“当人身自由和基本人权被剥夺了的时候，一个人对自由的全部热爱就会加倍倾注到对内心世界的自由追求上……即使是在逆境中，在一个最肮脏嘈杂的地方，一个内心自由的人也可以体会到生活的美”。流亡美国时，他又要面临身份的戏剧性重组，他先是从一个学生领袖变成囚犯，如今又获得了充分的自由，这自由可能解放他、也可能压垮他。

相较而言，台北仍是个不错的流亡地。各种各样的流亡者造就了这个岛屿。从郑成功到蒋介石，他们在此建立流亡政权，徒劳地面对中央帝国，从渡过黑水沟的泉州农民到百乐门的金大班，他们的乡愁无处安放、四向迷漫。

对于王丹，甜品店、夜半的诚品书店、蜿蜒的小巷、醉酒的朋友，台北让他找到另一种归属感，缓解不断滋长的乡愁。相比新英格兰的凛冽空气，台北潮湿、温暖，像是个温柔乡。他还找到了一直被压抑的作家身份，比起学运领袖、政治流亡者，这可能更符合他内心的渴望。在燕园的岁月里，除去民主沙龙，他也是文学杂志的创办者、热情的诗人，他在 1989 年初的一首小诗后来被张雨生谱成流行曲《没有烟抽的日子》，红极一时。在台北，他出版过诗集、散文集，一些作品被少年人评为最受欢迎的诗作。这重身份与趣味，似乎是他过分政治化的身份的一种平衡。

还是多年前，一位旁观者就发现，与其他学生领袖不同，王丹有一层更敏感的内心世界。他在狱中写下这样的句子：“秋日的傍晚，四、五点钟的时候，从半开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大群的归巢麻雀在落叶将尽的稀疏树梢间上下翻滚，桔红色的夕阳把半边天空染成金黄。这种色彩与窗外世界的静谧融合在一起，总是给我一种强烈的震撼。带着这难以言表的感受，我常常独自站在窗前，静静地目送夕阳的西下，直至夜色的降临。”它像是一种自我保护，防止自身被现实的残酷吞噬。他自己也说，因为有文学，他不怕输，可以在政治世界更放松，他可退回文学世界。

“那场冬雨像一个个性内敛阴郁的孩子，静默地坐在那里，尽管不暴烈，却令人窒息。我只有拥被坐在窗口前，看中山高架桥上至深夜仍车水马龙的一条光河，在雨幕的朦胧中一寸一寸计量时间的长度。”他这样描述冬日的台北，用的文章标题是《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我翻开王丹的新书《台北日与夜》，他写半诗半散文的段落，年轻的摄影师陈卓邦配上照片。整本书的情绪也是孟庭苇式的，一点点感伤的小布尔乔亚。

这感春伤秋的劲头似乎与 20 年前没什么两样，这值得庆幸，却有一种潜在的危险，他对世界与生活的认知没有太多的改变，也没有太多的深入。

读过他的回忆录、政治分析文章、诗歌与散文、还有 Facebook 上的生活点滴，我被一种深深的困惑包围着，他的高度戏剧性的经历似乎没有赋予他一种观察、理解世界的独特角度。他有高度的历史意识，正是这历史意识把他推向舞台中央，但他似乎又逃离了常与这历史意识伴随的深刻与沉重。他对于中国历史、对于民主看法，往往是常识的重复、缺乏必要的独特性。他高度敏感于个人感受，但他的个人感受却又少一层真正的自我追问，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文学趣味停留

在 80 年代初的朦胧与抒情气氛中。历史力量没有把他推入智力与人性的深渊，反而让他凝固在某个少年时代——他总是那个在北大塞万提斯像下组织沙龙的历史系学生，一个雄心勃勃的文学青年。

或许这也妨碍了他扮演更重要的历史角色。1989 年的天安门，不仅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也是全球历史的重要一刻。广场上的学生不仅感染了中国社会，也让整个世界屏住呼吸，对于东欧、苏联这些同样的集权主义国家尤其如此。在这个意义上，王丹与天安门学生，与波兰的团结工会、捷克的哈维尔与市民论坛、或是一年前的缅甸“88 一代”一样，是一场全球革命中的偶像人物。但王丹的意义似乎仍被局限于华人世界，没有演变成更辽阔的历史叙述的一部分。这其中当然有多重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他们成功了、中国失败了，或是中国足够大、已自成一个宇宙，也因为代际的不同。哈维尔、昂山素姬在领导各自国家的革命时已是智力与情感成熟之辈，他们更是“68 一代”，而不是“89 一代”……但这一定也与他的个人局限性、或者整个中国异议群体的局限性相关。我问起他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流亡者与异议者的交往，他说很少，也没表现出太多的兴趣。他说，这因为他的懒惰，也与内心骄傲有关，他没有动力去融入别人的世界，他有一个自足世界，正是这种自足让他可以坚持做一件事，而未偏离轨道。但倘若自由与民主是对多元价值的追求的话，这种缺乏对多元文化、另一种可能性的好奇心，可能给这种追求带来新的障碍。

很有可能，我的这些感受一点也不对。即使有一些道理，它又够公平吗？“流亡”，就像爱德华·萨义德说的，“Exile is strangely compelling to think about but terrible to experience. It is the unhealable rift forced between a human being and a native place, between the self and its true home:

its essential sadness can never be surmounted. ”（流亡想来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但体验起来却是可怕的。它是强行在人类与其原居地、在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一道难以弥合的裂缝：其根本性的悲哀是永远不能克服的。）

我从未经历过流亡的折磨，又怎好擅作评价。或许正是这种无法深刻的少年劲儿，让他熬过了监狱与流亡岁月，他成了“89一代”中最能保住昔日理想的一位。

或许我们应该在纵酒之后再谈论这一切。他对我说，通过书籍不能了解一个人，除非每一页都用酒精浸泡了。在经过多年的公共生活的训练后，他早已熟练地把自己的内在世界关闭起来，这种“狡猾”是他这样的流亡者必需的自我保护。

我们再度说起了北大，我知道，燕园始终在他的内在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他仍常想起落雪的未名湖，那种肃穆的寂静。他也仍宣称要成为北大校长的梦想，这比成为中国的民选总统更让他激动。当我说起三角地几年前被拆了，他竟淡然地说，那就再建呗。这不是无动于衷，而是一种对未来的强烈信念。是啊，蔡元培不过用一代人的功夫缔造了现代北大，我们为何不能再用一代人的功夫恢复它的荣光。

况且，历史是多么的不可测，只要稍微转化视角，整个节奏与主角就发生了变化。在我成长的时代，天安门是个被遮蔽与遗忘的主题，但或许再用不了几年，这些几乎被忘记的“天安门母亲”、刘晓波、王丹将占据媒体的空间，激起整个社会的情感巨浪。

既然我这位师兄钟情诗歌，我也把希腊诗人卡瓦菲斯的一首《伊萨卡岛》送给他：

*当你踏上伊萨卡之旅，*

愿旅途漫长，

充满奇迹，充满发现。

不要怕莱斯特律戈涅斯巨人，

独眼龙，或愤怒的波塞冬海神：

你不会在途中遇到这类怪物，

只要你高扬起你的理想，

只要你有一种罕见的兴奋，

激励你的精神和肉体。

只要把“伊萨卡”置换“天安门”或是“未名湖”，这正是王丹的旅程。而我也坚信，他也终将会像奥德修斯一样归来。（完）

## 受困的黑马

文/FT 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本文分三部分，分别于 2013 年 11 月 28 日，12 月 5 日，12 月 12 日发表于

FT 中文网，链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3654>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3766>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3885>)

—

“啊！中国，什么都是中国造的。”从开罗到阿斯旺，每个街头的小贩、导游、餐馆服务生、观光马车的车夫，都会这么说。除去中文的“你好”，他们叫得出 Jacky Chan (成龙) 与 Jet Li (李连杰)。两位有着更丰富知识的人，还会加上一句“中国要征服全世界”。另一位更有学养的人问我，中国人在苏丹有一个很好的项目，这是新的殖民地吗？

中国的影响力，随着运动服、球鞋、皮带、打火机、手机、汽车和游客，来到了埃及的每一个城市，或许那些木乃伊与金字塔的模型纪念品也来自于中国不知名的小厂。据说中国也摆放在穆巴拉克政府的政治议程上——怎样既垄断政治权力，又保持经济增长。

那是 2010 年初，我在埃及旅行。这个国家正处于一个既躁动、又没有方向的时刻，人人觉得这个独裁政权应该结束，却不知它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不过旅行者们往往沉浸在法老的埃及，而不是现实中。旅行者的生活既丰富又单

调。法老们留下的坟墓与庙堂，有着令人难忘的辉煌，夕阳下的尼罗河弥漫着诗意。很少有人追究这辉煌是建立在巨大的奴役之上的。一个观光者经常只能停留在浅薄的交流上，酒店服务员、导游、小贩，谈话总是形式、礼貌、油腔滑调的。我努力买到每一天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在一个阿拉伯语和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世界里，一篇英文评论倒给予了短暂的智力消遣。

12月26日这一天，我读到了刘晓波的消息。《国际先驱论坛报》的周末版蜷缩在卢克索的索菲特酒店的酒吧的一个角落里。正是圣诞假期，很少有人去翻阅它。中国政府不但更富、更强、更喧闹，也更狡猾了，它学会了在一个假日发布令人不快的消息。

在被关押了1年之后，刘晓波被宣判了11年的徒刑。几篇发表在互联网上的文章，一份措辞再温和不过的声明，他被宣布为阴谋颠覆政府——这个掌管这全球五分之一人口、被视作世界未来领导者的中国政府。

即使对中国政府的冷酷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这仍是个荒诞与严酷得过分的判决。你读得到其中的寓意——它是一个恐吓，它要杀鸡，还要把鲜血给猴子看。这猴子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这个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垄断的、别人无权关心，也有西方世界——不要试图干涉中国政府的内部事务，它如何对待自己的反对者，是它自己的事。

照片上的刘晓波留着短短的寸头，神态平静而疲倦，脸上流露着抽烟过度的痕迹。这是过去几年中，西方媒体经常使用的标准照。你很难想象，他曾经身体

极好，走在 20 年前的校园里，别人说他像是健壮的火车司机或搬道岔的铁路工人。

我记得在一年多前的德国的《明镜》上也看到过他。他在谈论北京奥运会对中国的影响，批评它变成了中国政府的另一次自我表演。这是他这些年的公共形象，一名对中国共党政权的不懈批评者。他谈论政治堕落、官场腐败、思想控制、知识分子的责任……不过，他所有的言论都只能出现在外文或海外华人的报刊与网络上。他也是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这个组织的成员既有流亡海外的作家，又有仍生活在国内的异议者。在中国大陆浩如烟海的出版物上，他们的名字与见解几乎从不会出现。政治审查封杀了他们，而公众则主动选择忽视与遗忘。这是个崇拜成功与欢乐的年代，流亡者与异议者身处社会边缘，他们是失败者，失败者的尖利批评则令人不适，没人愿意自己美好生活的幻象就这样被刺破。况且，他们刺出的剑也锋利不再——这些问题早已尽人皆知，不断的言说似乎只让人心生厌倦，他们沦为了姿态的俘虏。他们像是这嘈杂、热烈又麻木的中国社会的隐形人。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我来说，刘晓波只是一个抽象的名字，一个被定格的异议分子，一个隐约和天安门事件相关的历史人物，但历史这一页似乎翻过去了。只是在本文学理论书上，我见过对他的描述，或许也还记得他那句名言“中国需要做三百年殖民地”。对他既没有智力上的赞叹，也没有道德上的特别敬意。我还记得两三年前收到过他的一封电子信件，说是有机会相互认识一下。我没有回信，既因为不知道见面该谈些什么，或许更重要的是，我有点恐惧，担心这种

联系会给生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讨厌被安全人员跟踪、问话，令我的私人生活受扰。

“零八宪章”的流传也没有太多改变我的看法。我从未仔细地读过这份宣言，潜意识里认定这毫无意义，像是一次与虎谋皮。或者说它显得太陈旧了，这是一次捷克“七七宪章”的翻版，或是一次网络时代的“公车上书”吗？接着，宪章的签署者们则以各种方式被当局骚扰，而刘晓波被监押。事态的发展似乎仍可以被接受，这不是中国政府与异议者之间的一贯的游戏策略吗？因为常年生活在扭曲的系统中，你对于任何“公然的无耻”都习以为常。即使你有一时的叹息，也很容易消失在忙乱的生活里，你觉得这与自己关系不大。相形之下，倒是许志永的短暂入狱给我带了更直接的冲击——他是我的朋友、同龄人，一个态度和方式都极度温和的改良者，他蒙受的政治迫害，像是对我个人生活与价值的直接否定。

再接下来，我前往英国游学。这里的生活安静、疏离，也迫使我面对自己的内心。我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一些东欧作家的作品，他们都曾是各自国家的流亡者，身在异乡或即使在国内，也要被迫在内心流亡——他们的思想不为政权也不为时代所容。我也开始阅读一些海外中文网站，读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流亡者的作品。他们可能偏执，却有一种力量让人难以忽略——他们诚实地讲出了中国的现状，不管你用多少俏丽的名词、概念来装饰它，它仍是个不折不扣的极权体制，蔑视所有人的尊严。我们不仅要用成功与否来理解这个政权，还需要道德上的判断，而在道德判断之后，则是相应的承担。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一直在逃避些什么。我能够一直逃避下去吗？

刘晓波的十一年刑期，激起了世界舆论的哗然，也激起了我了解他的愿望，其中也暗含了我对自己未来的担忧——面对这样一个现代“文字狱”的国家，一个写作者该怎么办？

我在网络上寻找他的文章，下载他的书籍，听别人对他的描述。结果，我发现了一个生机勃勃、才华横溢、可爱冲动、诚实自省的刘晓波，他与那个被符号化的人物截然不同，你甚至可以说，他是个天才。

这一切还是从 1986 年说起。这一年 9 月，新时期文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它洋溢着自我庆祝的气氛，“文革”过去近 10 年了，作家与知识分子似乎有理由为自己的成就骄傲。他们从充满哀怨的“伤痕文学”开始，经历了“寻根”，探索了悲伤、焦灼、性、失落……他们拼命地吸收，也拼命地产出，既像是对之前空白岁月的反抗，又像是难以抗拒现实的诱惑——只要一篇小说，一首诗、一篇文章，他们就可能突然红遍大江南北。知识分子再一次站在了国家生活的中心。他们和党与国家的关系甜蜜，相信自己有力量制定这个国家未来的方向。公众则是他们如饥似渴的读者，准备追随他们的理念与号召，有时甚至是一句口号。他们觉得自己创造了一个“新时期”。

但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文学研究生却不这么看。他才 31 岁，操着仍旧浓重的东北口音，说到激动处，还会口吃，除去一两篇文章，没发表过任何像样的作品，但他声称“新时期文学丝毫没有值得骄傲的东西，相反却暗伏重重危机”。他看到了危机，是作家们正在陷入自满和倒退。他们为了否定“文革意识”而进行的“寻根”正变成一条不归路——在对传统的歌颂中，对现实的彻底批判、怀疑和反抗都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他的发言即兴、庞杂、极端，从刘心武、阿城跳跃到康德、卢梭，毫不隐瞒他对于庸常理性的厌恶，对非理性的崇拜。他这样坦然地结尾：“在和传统文化对话的时候，就是得把这样一些东西强调到极点：感性、非理性、本能、肉。肉有两种含义，一是性，一是金钱。钱是个好东西，任何人见了都要两眼放光。性，当然不是坏东西，尽管正人君子在表面上都撇嘴。”

他的发言让会场中一些人不安，而让另一些人兴奋难奈，他们想不到会有这样出乎意料的发言。其中一位是《深圳青年报》记者，不久后他把这篇即兴发言刊登他的报纸上。很多人一下子知道了这个偏激的年轻人，他是刘晓波，一匹“文坛黑马”。

刘晓波只是昙花一现的预言，是王蒙在这一年末接受采访时谈到的。但比起文学的权威，大学里的青年人似乎更喜欢听到这匹“黑马”的刺激腔调。刊载他演讲的报纸，从四分钱涨到两角。

在这次谈话不久后，一份杂志刊登了他的长文，仅仅题目就足以引人遐想——《与李泽厚对话》。在过去的10年里，没有一位思想家比李泽厚更富盛名，他对美学的阐述，像是开启了重新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而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解释，则没人比他更全面与深刻——他的思想被认为深刻、富有系统。

但刘晓波却准备公开挑战他，而且他成功了。我手上的这本《选择的批判——与思想领袖对话》出版于1989年7月的台湾，由这篇文章延展而来。一连几个夜晚，我被他思想与语言的锋芒与快感弄得激动难安。他的行文激情洋溢、又泥沙俱下。试图在句子与句子之间建立逻辑关系是徒劳的，不容置疑的语气、时

而闪现的洞见、还有包容一切的联想能力，才是让读者兴奋所至。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自己只是一种喷涌而出的思想与情绪的附庸，他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写下了什么。

即使对八十年代的文化背景缺乏了解，你仍然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足够多的乐趣。他斩钉截铁地判断“人始终在意识到人的局限，并想超越这种局限，而在现实中又无法真正超越的两难境地”，或是调味品式的戏谑，“宝玉对女人多情，熙凤对权力多情”，屈原与祥林嫂发出了类似的哀怨。

与《新时期文学的危机》一样，在庞杂的表面之下，主题是清晰一贯的——是个人对所有束缚的反抗。这种束缚既来自历史、又来自现实，既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是社会系统也内心的软弱。刘晓波似乎再次预感到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要吞噬刚刚开始觉醒的个人。他宣称，偏激是唯一的应对方法。

在广受尊重的李泽厚的美学理论“积淀说”背后，刘晓波发现它只是旧权威的借尸还魂。这种权威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李泽厚相信，所有的审美与价值，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与这个社会心理息息相关。在一个经过文化传统割裂、文化经验支离破碎的时代，李泽厚的探索，给予人们渴望的整体感与连续感，人们不再觉得自己孤独无依。文化大革命是不堪回首的经验，但之前的中国历史，仍有其价值，历史并非总是疯狂的，它有着特定的逻辑。

刘晓波却说李泽厚的文字中浸透着“害怕冲突的中庸观，廉价的理想主义，虚幻的乐观主义，保守的理性主义，软弱的服从意识”，这些特征正是中国传统

知识分子的痼疾。他在这些李泽厚论述中，再次感到了个体的死亡——他只是环境与时代的产物。而证明个人的唯一方法，是反叛、是对抗、是永不服从。要用偏激来对中庸，用幻灭与悲剧意识对抗廉价的理想主义与乐观主义，用赤裸裸的感官体验来对抗理性主义……他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自我，让这个自我变成他生命力与创造力的源泉，而不是去投身某种更强大的秩序——不管这个秩序是以国家、传统、还是社会为名。为了去击败这个中国传统，他也臆想出一个完美的西方文化形象，凡是中国文化缺乏的特质，西方文化就一定具有。

不过，没人追问他的种种判断是否禁得住推敲，是否大胆而直接盗用了尼采或鲁迅，不过是另一种反对唯理性传统的延续。青年人爱上了他这鲜明的姿态。他们感觉刚刚获得的自由之门正在封闭，政治与社会压力再度向他们袭来，急需某种渠道释放这种压抑。刘晓波四处受邀演讲，并总是语出惊人。“中国的文学只有打倒屈原、杜甫才有出路”，“每个人都要成为自己，自己就是上帝”，他在清华大学说。而在北京大学艺术节上，他甚至比北岛、顾城更受欢迎。他的感染力不仅来自语言，也来自他的表情与动作。“你从他的脸上似乎可以感到一股不可名状的压抑着的激情，这种激情突然会从他那滔滔不绝的言语中宣泄出来，使他进入一种近乎于迷狂的状态，”一位目击者说，“他常用他那发紫的嘴唇紧紧咬住烟蒂，然后用力猛一吸，在这一瞬，你可以看出一种难以言状的痛苦，甚至你会感觉到他的这种表情近似于冷酷和凶狠。”

到了1988年，他变成了一个传奇人物。他在这年6月的博士论文答辩会，像是一次学术上的摇滚演出。6月25日的早晨，上百名学生挤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一间会议室，他们要来旁听文艺理论博士研究生刘晓波的答辩会，题目是《审

美与人的自由》。当走廊也挤满人之后，校长决定将答辩会转移到一间可以容纳400人的大会议厅——刘晓波不仅要面对9位评委，还要接受这400名旁听者的目光……

刘晓波享受这新到来的名声，也从不掩饰自己对声名和金钱的渴望，有时还以一种挑衅的姿态表现出来。他的朋友李颀记得在1986年9月的研讨会上，刘晓波多么急切地要引人瞩目，他在电梯里用结巴的东北话说“这次咱们跟他们好好整一下”，他对《大学生》的记者说，说自己在友谊商店柜台前被一瓶洋酒击败了，他付不起几百元的价格。他的一个朋友则记得，在一些沙龙上，他是多么的出言不逊，让每个交谈者都心生不安。像是一个内心充满饥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孩子，他用傲慢掩饰窘迫，用尖利来引起关注，用放肆来表现与众不同。

但他很快发现，这种名声和桀傲多么的脆弱。1988年夏天他第一次出国。从挪威到夏威夷再到纽约，作为当代中国最引人争议的青年批评家，他要给西方世界讲述他眼中的中国文学。他依旧保持着一贯的愤怒，在路过香港时，他说这个城市就像一张不停咀嚼的大嘴，他仍旧诅咒中国，欢呼这个殖民地取得的成就，说“中国需要做三百年殖民地”才能改变现状，他也对引起轰动的《河殇》没太多的褒奖，尽管他们都被视作“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在奥斯陆大学，他对着邀请他来演说的汉学家们说，你们一点也不懂中国。

但在内心深处，一种深刻的沮丧和自我怀疑开始随着旅行而蔓延。他的信心没有被北京友谊商店的洋酒的价格、却被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击倒了。他发现在面对精美的人类文明时，他深感无力。他批判中国传统的理论，在西方世界不过是一个陈旧武器，他也不知道如何用这武器来继续他的批判。他熟练地诅咒愚蠢，

却不知道如何理解与创造更高的智慧。同时，他也失去了别人的关注，除去邀请他来的汉学家，这里没人对他有兴趣。

“纽约撕碎了中国带给我的所有外在装饰和虚名，”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突然明白我有多弱小。我甚至没勇气面对自己；我也没能力和世界级的知识分子真正对话。”

他感到无力，却没有失语。相反地，他写的比任何时刻都更快、更多、更激烈。他把孤独与自我怀疑，转化为新的愤怒，这愤怒不仅指向中国传统还有他自己。“在中国，愚昧的背景衬托出我的智慧，先天痴呆突显出我的半吊子健康；在西方，愚昧的背景一旦消失，我便不再是智慧；痴呆儿的烘托一旦倒塌，我便成了通身有病的人……”他在一九八九年三月的夏威夷写道，“在中国，我为一个掺入了百分之九十的水分的虚名而活着；在西方，我才第一次面对真实的生命呈现和残酷的人生抉择。当一个人从虚幻的高峰一下子坠入真实的深渊，才发现自己始终没有登上过高峰，而是一直在深渊中挣扎。”他也承认，不管他对中国的批判多么严厉，仍是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中国是他唯一关心的东西，而批判所依赖武器，则来自于对西方一厢情愿的美化。

外部声名和内在自信的双重坍塌后，令人晕眩。在叫喊了这么多年的发现自我之后，刘晓波发现独自面对真实的自己与世界，竟如此艰难，像是“长期在黑暗中不见天日的眼睛，已经很难尽快地适应于突然打开的天窗，突然见到的阳光”。

他也追问，为什么中国没能产生东欧与苏联式的流亡者，他们在陌生的土地上仍创造出不仅属于各自国家、更属于全人类的精神成就。

追问没持续下去，因为更大的诱惑在等待他，这片他诅咒的土地仍诱惑着他，他渴望活在人们目光的中心。临行前，在纽约的街头他对作家贝岭说：“在中国，你甚至放个屁都引人注目，在美国你最大声的呼喊也淹没在数不清的杂音里。”

胡耀邦在4月15日的逝世，激起了意外的回响。死亡刺激起人们的情绪与想象力。就像1976年周恩来的离去激发起人们对于十年内乱的愤怒，胡耀邦则让两年来改革停滞不断积压的挫败与压力找到宣泄口。通货膨胀、官倒、脑体倒挂、腐败、言论不自由……人们叫喊出所有问题，并认定民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个政权一贯的傲慢和青年人的急切，令一系列微小的冲突转变成社会与政权的强烈对抗。在刘晓波回到北京的前一天，《人民日报》的社论将学生请愿定义成“一场反革命动乱”。

“为什么中国人对类似周恩来、彭德怀、胡耀邦式的悲剧英雄的追思，要远远超过对魏京生式的悲剧人物的怀志？”刘晓波在回国之前的一篇文章里问道。像1986年9月语惊四座的发言一样，他不准备分享知识界对于胡耀邦表现出的普遍性哀叹和赞扬。在关于胡耀邦的连续三篇文章中，他质询了这种悼念热情。

“这次胡耀邦逝世现象，既反映了中国人要求民主的迫切乃至急躁的心理，反映了现行体制的腐败，更表现出中国知识界对民主的理解的浮浅乃至错误，”他解释说，“这是一次对中国民主精英们的民主意识和行动能力的测试，并显露出许多公认的民主斗士的弱点。这些弱点主要在三个方面：一、对执政党开明派

的权力的依赖和缺乏独立性；二、企图借开明君主完成中国的民主化，而忽略民间的民主力量；三、对民主的理解主要停留在意识形态化的口号上，而缺乏对程序民主化的关注。”

与三年前一样，他仍是少数派。但是他那些知名的偏激却一扫而空。比起别人的兴奋，他表现出惊人的冷静。他不反对大学生们的激烈行动，却强调方法与程序具体化、多样化、对实效的追求。他相信，民主的意识形态化才是导致民主运动原地踏步的深层原因。

他用台湾的《自由中国》、《大学》在民主转型中为例，强调“在中国，一份具有独发言权的民办刊物、一个具有自治权利的民间团体对于民主化的意义，要远远超过执政党的改革之举。”而民主的实验要“从一个学生小组，一个学生自治团体，一份民办刊物，甚至一个家庭的民主化做起。”

不过当他来广场时，他在文字上表现出的理性，发挥不了作用。很有可能，群众运动也轻易地激发起他的强烈情绪。或许他的理性也仅仅是另一种“反叛”——他要反叛狂热的群众。他轻易地和广场上的学生们挤成了一片，他才34岁，和他们看起来没什么区别。而且早在几年前担任老师时，他就经常挤到男生宿舍里，彻夜聊天，他还和他们在沙坑里摔跤。“其他大家也喜欢的老师，比如王富仁、任洪渊、蓝棣之等，也常请大家吃酒言欢，但操场是不会去的，”他的一个学生王小山回忆说。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是这场运动的主角，一个二年级学生吾尔开希还成为了全国学生领袖。

而现在，他们角逐的地方从北师大的操场变成了天安门广场。角逐的对象不再是彼此，而是一个政权。他们力量悬殊，静坐、绝食、喊口号是他们唯一的武器，而对方则拥有一切。他们很少能预见到未来的命运，也毫无政治活动的经验。比起日后“民主斗士”、“天安门四君子”、或是“幕后黑手”的评价，广场的刘晓波似乎仍只是操场上摔跤的大孩子，而绝食行动与其说是深思熟虑，不如说是当时的气氛使然。

“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时候，晓波一直和我们在一起，绝食进行到第二天，他说，大家放心，按照国际惯例，绝食到72个小时，任何政府都会站出来和绝食者对话。大家听了，开始盼望72个小时的到来，”王小山后来写道，“终于，72个小时到了，政府方面毫无动静，晓波开始郁闷，说：连南非这样的国家也不至于这样啊。——要知道，当时的南非和现在不同，那个时候，曼德拉还在监狱里。又过了两天，晓波又乐观起来，说，北京上百万人站出来了，游行声援，这会政府该出来了吧，不然也太说不过去了。”

最终，政府的反应比所有人想象的都更“说不过去”。甚至没有等刘晓波和他其他的三君子朋友完成三天象征性、又有闹剧色彩的绝食，坦克与鲜血结束了广场的喧闹、沮丧与愤恨。到处是恐惧、死亡、疼痛还有未定的惊魂。

刘晓波却表现出意外的兴奋与镇定。离开广场后，他在一处相对安全的房间暂住。他的一位朋友的回忆说，大多数人陷入绝望，觉得内战即将爆发，刘晓波仍旧如常地吃饭、开着玩笑、不停地抽烟，还不时地给朋友打电话，对着话筒大声说，“喂，我是刘晓波”。这是他性格的一贯延续，还是就像秋蝉知道时日无多，通过拼命鸣叫来缓解末日的焦虑？

6月6日晚上，他仍想骑自行车带一个朋友回家，接着他被路旁面包车里跳出的人按倒，一直到6月24日，媒体才公布他被监押的消息。

### 三

还是1986年底，王蒙曾经预言刘晓波是个昙花一现的人物，他将很快从舞台上消失。三年后，王蒙被免去了文化部长，而刘晓波则仍在舞台中央，而且是一场大批判的主角。

“选编在这本小册子里的刘晓波的言论，堪称为反动狂人写下的反共奇文，我们愿和读者诸君共同赏析、批判，以期把这些毒草连根铲除，化作肥料，用来壮大、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阵地。”天安门事件后，一本叫《刘晓波其人其事》的书籍，作为学习材料被四处派发。

和传统的专制体制不同，现代极权主义深谙宣传与思想改造的作用。政权要恢复它的合法性，它不仅代表着权力的正统，也代表着思想上的正统，它通过批判“异端”来教育普通人。

在逃亡的逃亡、入狱的入狱、沉默的沉默的一大批知识分子中，刘晓波不是最具权威、最知名的一位，他甚至是这场运动的晚来者。

但他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标靶。他的那些放肆言论，既充满快感也漏洞百出，从思想到行动都是一个无可质疑、不让人同情的“异端”。他的“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全盘西化”的言论可以轻易地让整个社会感到愤怒，令昔日屈辱涌

上心头。对他的批判也不会引发知识分子们太多同情，从文学分析到政治评论，他总让他们不安，他是一个闯入者。

刘晓波最终消声了，不仅是牢狱之灾、政治迫害，更是因为一个无情的新时代的到来。他在1991年出版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仍引起了一阵风波。仍旧是惊心动魄的语言，毫不留情地批判，并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曾与他同在广场的知识精英与学生领袖。一些人把它看作是真诚的忏悔录，与巴金的《随想录》、甚至如卢梭的《忏悔录》一样，是一个人对内心的痛苦探索，勇敢地袒露自己的伤口。但另一些人却觉得，这不过是他另一次自我形象的塑造。一些亲历者发现，他不仅编造了事实，而且在他所有看似诚实的忏悔与无情批判之下，仍隐含着这样的意思——我仍是这糟糕透顶的知识精英中最不糟糕的一位。还有一些人相信，这种自我羞辱背后，既是对关注的渴望，也是对他监狱里所为的救赎——他向当局写了“悔过书”。

但这风波像是一群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中的“茶杯中的风波”，它波及不到他最渴望的中国大陆读者。甚至整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群体，都已迅速被边缘化，被这个呼啸而来的新时代淹没了。

整个社会的语言方式改变了，尼采、卢梭、孤独、抗争，这些词汇过时了，青年人要听比尔·盖茨、核心竞争力、天使投资、PC机、商务舱。

刘晓波反叛者的形象也要过时了。干净、整洁、职业性微笑、穿西装、说英语才是新一代青年人的选择——他们要成为全球化的精英，而不是个落没的、声嘶力竭的边缘叛逆者。再没有四百人拥挤到教室里听一堂美学的答辩会了，只有

跨国公司的招聘会才吸引这么多人。甚至他的离经叛道，也算不上什么了。他曾经大谈金钱与性，它们是某种禁忌，但现在人人都谈它们，而且不只谈它们。他指责知名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社会的中心力量，而现在他们也沦为边缘，对他们指责缺乏意义。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要面对一个强大的中国。它不需要他们的拯救，甚至不再倾听他们的意见。像是对八十年代洋溢的希望、理想、热忱、自我崇高的逆反，他们躲回到自己的小世界，或者干脆以另一种姿态拥抱新时代——他们不再认定自己要充当批评的角色、追寻公共价值与意义，而是新秩序的赞美者。

只有一个批评对象不仅没有减弱，甚至更加强大、更加封闭——中国政治。那个才华横溢的批评家失踪了，一个政治异议者诞生了。在西方日渐繁多的对中国的经济报道中，偶尔会插进刘晓波的名字。

他递交请愿书，被劳改、监禁，他成了一名民主、人权的斗士。十多年前，他毫不留情地批评北京的“洋沙龙”，中国的作家与艺术家们像是这些西方外交官、记者、汉学家们的文化宠物。如今，他的名字必须依靠西方媒体才能仍勉强地不被遗忘。

时代不再理睬他，他仍在顽强地生长。最初表演式的批判、反省，慢慢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或许担心自己会堕入海外生活的虚空，他选择留在了中国。他逐渐成了一小群孤立无援者的核心人物。他们是那些拒绝遗忘历史的“天安门母亲”，中国残酷崛起过程中的批评者，一些拒绝沉默的社会活动家……在一个楼房越来越高、马路越来越宽、空气越来越污浊、声音越来越嘈杂、情绪越来越狂躁的北京城，他们是一群“看不见的人”，是“国家的敌人”。他们的家被人监

视，他们的拜访者要被审查与问话，他们不能自由出行，甚至买菜都有人跟随。这个政权一方面如此强大，另一方面却又脆弱不堪，认定自己足以被这一小群仅仅使用电脑键盘、试图维持记忆的人颠覆。他们被政权监视、被众人回避，只能相互取暖。与其说他们“斗士”，不如说他们想顽固地捍卫人最基本的尊严。在一些方面，刘晓波也更成熟了、更温暖了。丁子霖记得他的热心照顾，而他的学生王小山则回忆起，刘晓波试图保护他的正常生活的努力。

但在他不断发表的政治评论里，那个青年批评家的影子犹在。二十年前，他全盘否定这种文化传统，因为它吞噬了一代又一代自由的灵魂，他希望人们通过美学来获救。而现在，中国不断强大，但人们却依旧没有获得这种自由与尊严。中国人不再生活在信息的黑洞里，不再会被大都会博物馆所震惊，但在这表现出的开放与自由之下，是一种或许更惊人的禁锢。高压政治带来的恐惧、消费带来的诱惑与逃避、信息泛滥造就的无知、道德缺席之后的麻木，纠缠在一起。人们被它们俘虏，却仍自以为主宰了命运。与二十年前相比，刘晓波的敌人似乎更多了，令他愤怒的愚蠢以各种新形态出现。他要戳破“胡温新政”的幻象，要警惕民粹主义的泛滥，要人们警惕爱国主义的危险，更重要的是，他还要反抗知识分子与整个社会越来越强烈的犬儒主义的新现实——人们什么都不再相信，连反抗本身都变成了一种笑料。他从来就不是个“虚无主义者”，在否定与反抗之后，他要寻求新的意义。

#### 四

2010年1月6日，哈维尔和他的朋友前往布拉格中国使馆递交抗议书，一封抗议中国政府宣判刘晓波11年的公开信。这一天也是“七七宪章”发表的33周年。1977年1月6日，哈维尔、简·佩顿克、海耶克等一群捷克斯洛伐克知

识分子，向布拉格政府递交一份请愿书，要求尊重捷克宪法所保障的每个人的民主权利。请愿书的内容以外，它不过是对捷克宪法中一些内容的强调与重申，它也是对一年前捷克政府参与签署的赫尔辛基协议的回应。距离“布拉格之春”已经9年了，捷克人生活在一种希望幻灭后的虚空中。没人知道这政治专制还会维持多久，它不仅妨碍了经济增长、破坏了生态环境，还已经腐蚀与窒息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空气里、人们的谈话里弥漫着冷漠、麻木、玩世不恭。

但与众不同的是，“七七宪章”不是政治宣言，不是政治组织，它也没指望挑战现行的政治秩序，它是知识分子们对自身信念的一次重申，或许也是一种相互勉励。它呈交给政府，却更是指向社会的发言——即使先行的政治并未改变，我们也将努力按照自己内心期待的方式生活，诚实地表达自己所想，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不再生活在谎言中。这也是东欧涌现出的新哲学，他们知道不可能直接对抗现行政体，也知道期待所谓党内政治改良派的期望总是一再落空，而且这种期待经常是以丧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为代价的（他们要依赖于这种以改良面目出现的权力）。所以，他们不如努力寻求自治，并呼吁社会空间的独立成长。

哈维尔的故事最终成为一个现代童话。一名剧作家成为一幕现实政治的导演者，他成了一名政治领袖，领导一个国家从专制走向民主，而“七七宪章”则变成了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史的光荣一页。但童话隐藏了现实的残酷，宪章的签署者们入狱、流亡，他们自己必难以预料到日后的成功。

“‘六四’以后的沉寂与遗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一个是挺身而出的道义巨人，”刘晓波在几年前写道。他所说的道义巨人正是苏联的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捷克的哈维尔、南非的曼德拉式的人物，他们在民族心灵被蒙蔽时，变

成了精神的坐标与道德上的鼓舞。这再度回到了他在二十年前的老问题——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伟大的心灵？不管海外的流亡者，还是仍在国内的异议者，他们在创造力与道德力量上都没有令人赞叹的成就，甚至陷入了相互斗争的烂泥潭。

在某种意义上，“零八宪章”是对“七七宪章”的回应，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对于一种普遍价值的确认。也像“七七宪章”一样，“零八宪章”的口气温和、不过是对很多既定论述的重申，它既是对六十年前的人权公约的呼应，也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之内。

不过，它还是成为了一匹令人恐惧的“黑马”。令政权惊恐的不是它的内容，而是在经过二十年的压制、分化与收买之后，竟仍有一群人试图聚合在一起，发出群体性的声音。对刘晓波的宣判，的确激起了已经分化多年的知识界的共识。在哈维尔文集的中文翻译者崔卫平的电话访问中，所有重要的知识分子，不管他们是否赞成刘晓波的观点，几乎都表达了对审判的不满——这是又一次因言获罪。

中国一方面看起来日新月异，二十年前没人能想象它会变成今天的模样；但另一方面却又停滞不前，一些时候甚至倒退了。在2009年末接受的一次采访里，多年不露面的李泽厚说“我们要过封建资本主义这一关”。暂且不去理会“封建主义”的确切定义，上一次对“封建主义”的辩论发生在1982年，它被理解成一种惯性极大的专制文化传统。

人们也普遍用“文字狱”来形容刘晓波的入狱。正如在康雍乾的盛世之下，独立思想大受屠戮。历史学家余英时把他比作另一个范仲淹。就像范仲淹的流亡，

每一次入狱也使刘晓波更伟大。他们挑战了王权，遵从了更伟大的道统。在余英时看来，真正的儒家理想一定与此刻的普世价值观不无相似。

这种类比或许不一定恰当，刘晓波也不一定喜欢，他在中国传统里看到的是无尽的压抑与黑暗，而不是光辉。但就像每个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身上都蕴涵着深深的传统印记一样，你也可以在刘晓波身上找到对应的特征。倘若范仲淹不完全恰当，你也可以在晚明的李贽身上找到相似之处。面对一种无处不在的正统思想的压力，李贽通过疯狂来获得自由。个人自由在中国历史上如此的罕见，政治权力的压迫与诱惑、庞大的人际网络、儒家思想的支配力量，让个人独立与自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魏晋文人纵情山水的逃避是一种方式，李贽式的疯狂，变成了最后的可能性。八十年末的刘晓波，不也在反对一切昔日的正统力量和正在成为新正统的力量，并在这一反对的过程，获得暂时的自由之感。

在这种意义上，他既是毛泽东时代的受害者，也是受益者。毛泽东时代以一种相悖的方式塑造了中国人，一方面是思想上的高度专制，所有人都只读一种书，高喊一种口号，另一方面，则是一种空前的自由，所有的机构都陷入了混乱，所有的社会束缚都消失了，一个少年人可以无所不为。刘晓波以“黑马”的姿态闯入文坛，带着“红小兵”造反有理的冲劲。

这些类比可能有助于理解刘晓波，却仍无法进入他的内心。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否会服完这 11 年徒刑。如果一直到 2020 年，他以 60 岁的年龄才出狱，他会完成进一步的升华，变成一些异议人士所期待的民族英雄吗？只有很少的人，能如甘地、曼德拉、金大中一样从漫长的牢狱之中获得重生，大部分人身心俱疲。

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刘晓波不是昙花一现式的人物，他仍活在舞台中央，即使这个舞台被暂时地遮蔽与遗忘。他总令人想起肖伯纳的名言：“正常人适应世界，疯子却经常让世界适应他自己。推动历史变革的几乎都是疯子。”

“刘晓波是昙花一现”的预言者王蒙，如今大谈道家的轻逸，说中国文学正处于它历史的最好时刻。比起刘晓波的不合时宜，他永远那么与时代合拍，那么正常。

## 五

上面的文字写于2010年3月。7个月后，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是个既出人意外、又在意料之中的结果。在中国人对诺贝尔奖的所有情结中，和平奖是最少提及的，1989年得奖的达赖喇嘛更多被视作一个外来者。比起物理、化学、文学与经济，和平是个过分抽象的概念。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纠缠于自己内部的重重问题，没有耐心去关注更广泛的世界问题，这种道德上的麻木在我们对待朝鲜、缅甸、苏丹的态度上可见一斑。和平奖总是与世界的纷争有关，而我们只关心自己的纷争。我们总是觉得自己的经济成长或体育盛会对世界富有价值，却很少意识到，我们的内部纷争同样富有意义。在这种意义上，刘晓波低估了自己的能力。21年前，他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感慨，中国知识分子只能学习与复制西方的思想。但事实并非如此，自由、民主、人权，这些理念，或许早已被一代代的西方理论家们“过度阐述”了，已有了清晰的定义与边界。但在实践之前，概念仅仅是概念，每一次实践都将为它增加新的内涵与维度。

在获奖的消息传出后，你几乎可以在北京的空气中嗅得到这飘荡的喜悦。人们聚在一起喝酒，心里带着恋爱式的甜蜜，急于把心中的甜蜜告诉更多的人。“你知道吗，它的奖金有 1000 万人民币，可以在东二环买一套最好的房子。”我的一个朋友试图向一位出租车司机解释，刘晓波是谁，诺贝尔和平奖又是多么有价值。而我的朋友余杰失声痛哭，既是为他的朋友，也是为所有的异议者。

“空气中飘荡的喜悦”当然是被夸大之辞，是心理的奇妙反应，因为这 1700 万人的城市中的绝大部分人压根就不知道刘晓波是谁。甚至在一所著名的大学里，一位主管学生社团的教师警告他的学生不要举办敏感的活动，因为据说“一个王晓波的异议作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伴随着官方媒体的口诛笔伐，刘晓波的名字必将被更多的人所知。但他的获奖会为中国带来深刻的影响吗？

做出这个判断仍为时过早。历史的类比并不恰当，刘晓波既不是 1975 年的萨哈罗夫，也不是 1991 年的昂山素季。在后两位获奖时，他们都已是各自国家的知名人物，拥有巨大的道德声望。即使如此，他们对各自国家的政局的直接影响，也没有浪漫主义者门描绘的那样显着。中国共产党政权的韧性、中国社会的遗忘与冷漠，都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强大。

“反对派的整合自动完成了，”我的一个朋友这样说和平奖的效应，刘晓波自动成为了民间反对派的领袖。他还把温家宝总理在政治改革问题上的大胆讲话，理解成党内自由派的觉醒。对他来说，这两种力量的结合，将改变中国。我想这也是很多人的乐观情绪的主要来源。

我对此不置可否，心中多少有些不安。为何我们考虑问题的视角总是如此功利化，似乎一种伟大的情感从来不具有独立意义，除非它能转化成具体的行动和结果。我甚至多少感觉到，人们对于刘晓波本人失去了兴趣，只关心他这个符号意义，能有什么现实价值。

在刘晓波获奖后，有人还编造出一个荒诞的新闻，来讥讽中国政府的气急败坏。据说南京组织了反对挪威的游行，提出禁食从这个北欧小国的三文鱼，一位激动的群众当场焚烧了一本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

这则新闻令人莞尔，不过它令我想起了村上春树在几年前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时说的：“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我们都是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的一个一个的人，都是面对体制这堵高墙的一个一个的蛋。看上去我们毫无获胜的希望。墙是那么高那么硬，那么冰冷。假如我们有类似获胜希望那样的东西，那只能来自我们相信自己和他人的灵魂的无可替代性并将其温煦聚拢在一起。” 刘晓波就是这样一个的鸡蛋。

## 六

四张照片——两张笑、两张哭——并列在一起。在 2012 年末的的《苹果日报》上，我看到刘霞。因为看守的疏忽，美联社的记者意外地进入了她的寓所。自从他的丈夫刘晓波在两年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来，她一直被软禁在北京玉渊潭的公寓房里。除去每月例行的探监与家人会面，她哪里也不能去。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信号，除去电视机，她在这半空中的水泥房间里，没有任何与外界联系的渠道。

“太荒诞了。我觉得卡夫卡都写不出比这更荒诞、更不可思议的东西。”她对来访者说，她的表情由惊喜转成了嚎淘。荒诞不止于此，在那几天的香港报纸上，刘霞的形象总与莫言并列在一起，后者即将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国家曾经狂热于诺贝尔奖，把它视作民族崛起的标志。但这境内的两位获奖者的命运却如此悬殊——一位身陷囹圄、妻子被隔离，另一位则登上了所有电视、报纸、网络的头条。而除去姿态性的表态外，被镜头与麦克风包围的莫言没准备对刘晓波表现出任何支持。而在几天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莫言还准备为中国的“言论自由”、也为自己的一贯胆怯辩护——任何国家与制度都存在审查，适当的审查有助于文学创作。

刘霞与莫言的境遇反差，在香港的媒体上激起了轩然大波。我多少有些意外我周围朋友的强烈反应，他们对于刘霞的遭遇与莫言的扭曲人格都愤慨不已。这当然与香港越来越强烈的“反北京”的情绪有关，它更是一种本能性的反应——你可以指责这个城市过分功利主义，但由于从未经过极权与专制的洗刷，人们普遍性地保持着一种天真。“不是一直如此吗！”我想嘲笑他们对于这个政权的无知，却旋即发现我自身的麻木。我对于这不公不义，习以为常，连批评都是习惯性的、犬儒式的。我知道，在中国境内，除去一个小小的异议群体，几乎没人关心刘晓波与刘霞的命运，这与昂山素季在缅甸、曼德拉在南非、施明德在台湾迥然不同——堕落的政权高效地催生了一个堕落的社会，令反抗者更为孤立。

“集中营并不可怕，如果人只是在里面受苦，死去；集中营的可怕之处在于，人要在里面生活，”一位斯大林集中营生活的经历者说，“因为囚徒相对于他自

己来说已经堕落，存在着集中营的国家已经腐烂，集中营世界不可避免具有传染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它是人类最大的不幸。”

在某种意义上，刘晓波与刘霞生活在一个小小的集中营里，而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更大的集中营中。这的确比卡夫卡的城堡更荒诞，你只是无法进入城堡、感到无法实现最初的目标，而在集中营中，被囚禁是你的身体、也是你的灵魂，它们的状况每天都在恶化与堕落。与传统的集中营不同，今日中国的这个集中营里面还充满了各种狂欢式的诱惑，它麻痹你的堕落。莫言的小说，正是沉浸在这种堕落中，它以揭露与批判为名义，却很少有尖锐的痛苦，它与这堕落纠缠在一起，纵情其中。

我不知怎么改变这一切。改变总伴随着巨大的痛苦，在写一篇专栏中坦诚自己的堕落是一回事，在真实的生活里，能持续地抵制堕落，则是另一回事。堕落不仅以胆怯的面目出现，更经常蒙着诱惑的面纱。中国的巨大规模效应，既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忘却真相，也足以迷惑外来者。那匹曾不安的“黑马”如今仍寂寞地被关押在这现实中国的黑洞中，我们甚至经常遗忘这个事实，认定一切都是正常的。

我又想起了埃及的旅行，这个国家驱赶了穆巴拉克、如今又保释了他，革命令人陶醉，随之的后遗症又让人难以消化。这一切挑战都等在中国的前方。我很好奇，那匹“黑马”怎样思考这一切？（完）